

求大同

从古到今的梦想

谭 惟



“大同”思想的渊源

《礼记》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人阐发《仪礼》的文章汇编，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。其《礼运》篇对“大同”的定义，大概有三层内涵：

一是“天下为公”的政治理念。东汉大儒郑玄注《礼记》曰：“天下为公，谓天子位也。为公，谓揖让而授圣德，不私传子孙，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。”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《礼记》曰：“不家之者，谓不以天位为己家之有授子也。”可见，“天下为公”更多是从国君、天子的角度而言，“私传子孙”是“为私”，“为公”则需“德配天地”，国君以其“圣德”为天下苍生计，方能担当“天子”之位。相传尧舜禹“禅让”帝位便是“天下为公”的典范。

二是“选贤与能”的为政方略。“与”是推举、选举之意；贤，指德行；能，指才能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曰：“天位尚不为己有，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与天下共之，故选贤与能也。”在儒家看来，“选贤与能”是天子“德配天地”的具体行为，正因为明君懂得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天下并不是私家之天下，所以无论是选拔君位继承人，还是任用文武百官，都遵循“选贤与能”的方略。

三是“讲信修睦”的社会秩序。天子能够实行“天下为公”之大道而“选贤与能”之方略，则百姓蒙受德泽，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“讲信修睦”的大同气象。“讲信修睦”即是指国君能够谈说有信、政令无欺，君既言信行睦，上行下效，世人便皆讲求信用，和睦相处，社会便会呈现出繁荣、富足、平等、无私的“大同”景象，《礼运》中从“人不独亲其亲”到“外户而不闭”即是描述了这样一种“大同社会”的美好图景。

“大同”思想在儒家传承中有其深远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。尧舜禹三代之治，被儒家认为是上接炎黄、下启三朝，行禅让，便是大同之世。《论语》中孔子也多次赞叹尧舜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？”流露出对尧舜时代的强烈向往。从夏禹之后，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，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，中国历史上遂从“公天下”变成了“家天下”，大同之世便退出了历史；但后世大儒的政治理想基本上并不以汉唐为高、而是以追寻“大同”为目标，所谓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

“大同”与“小康”的关系

其信，著有过，刑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势者去，众以为殃。是谓‘小康’。”

“小康”描绘的是在夏禹之后到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治理下出现的盛世。尧舜禹之后，中国社会朝向“小康”的现实努力，恰恰是“大同”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具体落实，这是理解儒家为政之道的核心之一。“大同”与“小康”都是“大道”的体现，本质上并无高低之分，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大道的“行”与“隐”。“隐道”绝无“失道”“丧道”之义，只是尧舜之后，“大道之行”隐在了小康之治里，“小康”恰恰是“大同”之寄寓。换言之，“小康”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是“大同”，“大同”的现实演绎和开展就是“小康”。

“小康社会”的基本核心内涵是：第一，天下为家；第二，礼义为纪；第三，兵刑为用。“小康社会”的构想是通过“礼治”实现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的双重目的，即通过切实可行的宗法制度、礼乐制度等手段，来维护个人、家、国、天下的“私利”与“公利”，最终实现秩序井然、国富民强的理想社会。从某种意义上，“小康”是将“隐微”之“大道”表露出来，恰恰体现了“大同”所言“大道”之“施行”，与“大同”的内在追求是完全一致的。实现“小康社会”的目标，是迈向“大同社会”的必经之路。

“大同”思想的时代意义

义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为了实现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的“大同”愿景，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，提出了20世纪末我国将要实现“小康社会”的构想和目标，中国社会开始为此努力。党的十六大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“小康社会”的具体内容，即六个“更加”：经济更加发展、民主更加健全、科教更加进步、文化更加繁荣、社会更加和谐、人民生活更加殷实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“中国梦”的重要思想和执政理念，并把“中国梦”定义为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梦想”。他在相关论述中还提出了“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六个范畴，这正是实现“中国梦”的核心价值和实践方向，其中“求大同”可谓“中国梦”的最高目标。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，又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。

（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
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□ 汉字故事

“栖霞寺”：皇帝老儿写简化字？

杨立新

在距南京城东北20多公里的栖霞山上，有座名列佛教“四大丛林”之一的南朝古刹——栖霞寺。栖霞山又名摄山，因山上盛产药材食之可以摄生而得名，故栖霞寺寺门门额上悬有一块“摄山栖霞寺”竖匾（见图一）。



图一：寺门匾额“摄山栖霞寺”

2005年8月28日，南京《金陵晚报》一篇《栖霞寺匾额有误》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，打破了这座千年古刹的宁静。下面是报道的部分内容——

昨日，本报读者林先生打来热线称，栖霞寺庙门上的匾额有错别字，“栖霞寺”应该为“棲霞寺”，因为寺上匾额的落款是“御笔”，也就是皇帝的手迹，因此是不可能出现“栖”这个规范后的简体字，而应该是它的繁体写法——棲。

记者就此特地前往栖霞寺，向寺院的隆相法师求证林先生的说法。

记者在寺院山门前看见，由当代书法家赵朴初题写的山门为繁体字的“摄山棲霞寺”（注：应为“棲霞禅寺”。见图二），而落款同样也是繁体。但是寺门匾额却是简体版的“摄山栖霞寺”，落款为“御笔”。情况与林先生所说一致。



图二：山门门额“栖霞禅寺”

寺院的隆相法师解释说栖字的简体和繁体在古代其实是通用的。但是这个匾额究竟是哪个皇帝题写的，法师说已无从考证。

“栖”字的简、繁体真的在有皇帝的年代就通用了吗？记者向地方志专家王涌坚求证。王涌坚听后否定了隆相法师的说法。王涌坚说，古代人不可能用“栖”这个简体字，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要用到“栖”的地方一般都用它的繁体字，包括《词源》都标注“栖”是“棲”简化后的写法。

王涌坚说栖霞寺庙门匾额究竟是哪个皇帝御笔、是不是皇帝御笔都尚待考证，但是以皇帝的名义题写简体字显然在推理上是站不住脚的。

今人写繁体字，而古人写简化字，岂非咄咄怪事！

其实，隆相法师的解释是正确的，古代“棲”“栖”通用。翻开唐代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，“栖”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“吴越人家”：
古法蓝染书写“现代匠心”

王锦强 吕春生



“吴越人家”萧山过江布染织技艺晾晒

荀子《劝学》有句名言“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，此处的蓝即为蓝草。相传，秦汉时期，杭州先民在葛岭找到蓝草，可用于印染，并且经久不衰。于是在吴越之地开启了蓝草种植历史，蓝染作坊兴起，蓝印花色蔓延。当地老百姓将此草提取色素染衣着装，谓之“青衣百姓”。至今还存在于杭州上城区的知名的街坊地名如刮浆坊巷、染坊弄、浣纱路（河）、布衣弄，活色生香地向世人叙述了杭州“古法蓝染”的浪漫故事。

地处杭州吴山脚下、宋韵小镇繁华地的“吴越人家”，是体味杭州“老底子”文化记忆的好去处。虽然从事古法蓝染手工艺劳神费力，但坚持传统的天然植物印染仍是杭州织造艺术的一处美景。看到各种蓝印花布工艺品和充满水墨风情的丝巾，仿佛回到了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。

“吴越人家”的掌门人吴莹夫家是“老字号”染坊家族，曾经营的“一新坊”在江浙一带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萧山过江布染织系其

“棲”二字都有收录，标明“棲”为俗字，“栖”为正字。简化字舍繁取简，舍俗取正，是正确明智的选择。

那么，怎么会出现两个同音同义不同形的字呢？“棲”，我们一望而知为形声字，“妻”为声符；“栖”，从木从西为会意字，同时“西”也兼表声。

关于“西”字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鸟在巢上也。象形。日在西方而鸟西（栖），故因以为东西之西。”下面是“西”的字形演变：



大家看，“西”的甲骨文、金文字形像鸟巢形；小篆则在鸟巢之上加一折叠曲线以为鸟形，表示鸟落在巢上休息。所以，“西”的本义就是鸟巢，兼有栖息之义。故“西”是“栖”的古文写法。

《说文解字》亦收录“棲”的篆字，释为：“西（栖）或从木妻。”清段玉裁注曰：“盖从木、妻声也，从妻为声。盖制此篆之时，已分别西为东西，棲为鸟在巢。而其音则皆近妻矣。”就是说，在“棲”字出现之时，“西”字已专指方位了，并另造一“栖”字。

其实，这场争论的答案就在身边。在栖霞寺山门外，立有一通江南古碑——刻于唐上元三年（676年）的《摄山栖霞寺明徵君之碑》，唐高宗李治撰文，唐代书法家高正臣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地镌着“栖霞之寺”4字（见图三）。同时，碑题名中“摄山栖霞寺”的写法也与寺门匾额完全一样。



图三：《摄山栖霞寺明徵君之碑》

至于寺门匾额上“摄山栖霞寺”为哪个皇帝的御笔？仅从书风判断，似应出自乾隆皇帝之手。乾隆雅爱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，浸淫其中数十年，其书工稳圆润，婉转流畅，楷书中多夹有行书笔意。如果不错的话，旁边铃盖的应是“乾隆御笔”玺印。另据资料显示，乾隆曾在栖霞寺建造行宫，5次御驾亲临，为栖霞山下写下116首诗歌，在《乾隆御制诗文法帖》中，“棲”“栖”两种写法都有使用。至于乾隆题写“摄山栖霞寺”时，为何舍“棲”而取“栖”？我想主要是出于整体布局均衡的考量。因“摄”“霞”两字笔画均较繁密，而“栖”字夹在中间需要相对收敛，故选用笔画较少的“栖”，以便分出宾主。

这正是：栖棲自古存，简化定一尊。岂料千秋后，丛林文字门。

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〈通用规范汉字表〉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》阶段成果）



我们要更加全面领会大同思想，还需结合它与“小康”的关系。

继“大同”之后，《礼运》紧接着描述了“小康”：“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。货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，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，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，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



毛泽东曾用“大同”来表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“论人民民主专政”一文中指出：“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，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。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：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，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。康有为写了《大同书》，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。……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。”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